

Bru-sha 與 Sbal-ti 漢譯源流考*

王 璞

雲南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

前 言

十九世紀安多高僧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 (Brag-dgon-pa Dkon-mchog-bstan-pa-rab-rgyas, 1801–1866) 所著《安多政教史》(*Mdo-smad-chos-'byung*) 是藏族史學史成熟期的扛鼎之作，全書史料宏富，卷帙浩繁，故又名《史海》(*Deb-ther-rgya-mtsho*)。¹ 在《安多政教史》的起首位置，智觀巴就對傳統藏區的劃分做了總結：「藏區分為上、中、下三部。上部為阿里 (Mnga'ris) 三圍，這個地區又復分為：布讓 (Spu-rangs)、芒域 (Mang-yul)、桑噶爾 (Zangs-dkar) 三部為一圍；黎 (Li)、祝夏 (Bru-sha)、罷蒂 (Sbal-ti) 等三部為一圍；象雄 (Zhang-zhung)、上下赤代 (Khri-te) 等三部為一圍。」² 阿里三圍狹義上指芒域 (Mang-yul，一譯「孟域」) 湖圍、布讓 (Spu-rangs，又作 Pu-rangs 或 Pu-hrang，一譯「布商」) 雪圍和古格 (Gu-ge) 崖圍，³ 對應之古代王統 (rgyal-rabs) 分別為拉達克 (La-dwags)、布讓及古格，皆由吐蕃王室後裔孳衍而出。相較之下，《安多政教史》敘述的阿里三圍應是延展性的廣義說。深一層論，吳均等前輩所

* 本文在評審過程中承各位匿名審稿人悉心賜教，謹致謝忱。

¹ 參見 Dan Martin, *Tibetan Histories: A Bibliography of Tibetan-Language Historical Works* (London: Serindia, 1997), p. 163。

² 智觀巴·貢卻乎丹巴繞吉 (Brag-dgon-pa Dkon-mchog-bstan-pa-rab-rgyas) (著)，吳均、毛繼祖、馬世林 (譯)：《安多政教史》(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1989年)，頁3。

³ 芒域泛指阿里札達 (Rtsa-mdag) 以西的地區，或徑指拉達克。芒域又作「瑪域」(Mar-yul)，英國藏學家大衛·斯內爾格羅夫 (David Snellgrove) 認為，Mar-yul 是早期的寫法，後來又寫作 Mang-yul，蓋因藏文字母 ra 和 nga 形近相混所致。布讓當今阿里普蘭 (Spu-hrang) (一說為桑迦 [Zangs-dkar] 雪圍)。古格遺址則散布於今天的札達一帶。參見索南堅贊 (Bsod-nams-rgyal-mtshan) (著)、劉立千 (譯注)：《西藏王統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169，注193；頁226–27，注769；David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Boston: Shambhala, 2002), p. 393; p. 429, n. 85。

譯之《安多政教史》花費了不少心血，後學自當感謝。不過「黎(Li)、祝夏(Bru-sha)、罷蒂(Sbal-ti)」是藏族史及中亞史上的重要地名，其譯法卻令人不解。《安多政教史》另一節譯本又譯為「里域、朱夏、巴德」，⁴同樣不明所以。Li 或 Li-yul 在藏語中一般指的是信仰佛教的于闐國(Khotan)，⁵對此前人已有考釋，無須贅言。⁶吳均等譯本的譯注裏也談到 Li 為吐蕃時代于闐一帶地區的名稱，⁷而在此採用音譯顯然不當。「祝夏」吳均等譯本注為「即唐時之大小勃律」，⁸《藏漢大辭典》亦以 Bru-sha 作勃律講；⁹Sbal-ti 則不見於《藏漢大辭典》。再檢閱漢文論著，僅有隻言片語談及 Bru-sha 和 Sbal-ti，且訓釋粗疏，言辭含混；反之域外成果相對較夥，不過某些材料也需在「顯微鏡」下慎加考究方顯本真。如此看來，單憑簡略的記述或簡率的「對音」實不易求得這兩個地名的確切漢文譯名及相應歷史內涵。

大小勃律古事辨

Bru-sha 對應「勃律」或為某種學界共識，但 Sbal-ti 又如何解釋呢？在此，筆者以為「勃律」是頗令人困擾的一個詞彙，而這個詞恰恰又是探究 Bru-sha 與 Sbal-ti 漢文譯名的鑰匙，所以我們不妨以漢籍有關勃律的記載作為此一考證的起點。按《新唐書》的載述，勃律在唐代有大小之分：

大勃律，或曰布露。直吐蕃西，與小勃律接，西鄰北天竺、烏菴。地宜鬱金。役屬吐蕃。萬歲通天逮開元時，三遣使者朝，故冊其君蘇弗舍利支離泥為王。死，又冊蘇麟陀逸之嗣王，凡再遣大首領貢方物。

⁴ 止貢巴·貢卻丹巴然杰(Brag-dgon-pa Dkon-mchog-bstan-pa-rab-rgyas) (著)，星全成、尼瑪太(譯)，黎宗華(校)：《安多政教史(青海分冊)》(西寧：青海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文學室，1988年)，頁1。

⁵ 《大唐西域記》稱之為「瞿薩旦那國」(Gostana)，當今新疆和田、洛浦、墨玉、于田諸縣域。參見玄奘、辯機(原著)、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001-5；馮志文等(編著)：《西域地名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574-75。

⁶ 參見索南堅贊：《西藏王統記》，頁95；頁195，注506；M. Aurel Ste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07), vol. 1, pp. 151-66;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pp. 332-36, 351-52, 385。

⁷ 智觀巴：《安多政教史》，頁3，注10。

⁸ 同上注，注11。

⁹ 張怡蓀(主編)：《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頁1905。《拔協》(Sba-bzhed)、《漢藏冊府》(Rgya-bod-yig-tshang)、《如意寶樹史》(Dpag-bsam-ljon-bzang)、《土觀宗派源流》(Thu'u-kwan-grub-mtha')等藏文史籍也載有 Bru-sha 一詞，然作者均未明示其地理位置。

小勃律去京師九千里而羸，東少南三千里距吐蕃贊普牙，東八百里屬烏菴，東南三百里大勃律，南五百里箇失蜜，北五百里當護密之娑勒城。王居孽多城，臨娑夷水。其西山顛有大城曰迦布羅。開元初，王沒謹忙來朝，玄宗以兒子畜之，以其地為綏遠軍。¹⁰

史書明確指出大勃律在吐蕃西面，出產可做藥材、香料或黃色染料的草本植物鬱金。這一役屬吐蕃的國度西鄰北天竺和烏菴，烏菴（或稱烏仗那）即梵文所示 Udyāna 或 Oddiyāna（藏語 U-rgyan），當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河流域（Swāt/Svat）。¹¹ 小勃律南面的「箇失蜜，或曰迦濕彌邏。北距勃律五百里，環地四千里，山回繚之，它國無能攻伐。王治撥邏勿邏布邏城，西瀕彌那悉多大河。地宜稼。多雪不風」。¹² 臣服「天可汗」之箇失蜜¹³（Kāśmīra/Kashmir，藏語 Kha-che）的地形在〈悟空入竺記〉裏描寫較詳：「其國四周山為外郭。總開三路以設關防。東接吐蕃北通勃律。西門一路通乾陀羅。別有一途常時禁斷。天軍行幸方得暫開。」¹⁴「乾陀羅」即《大唐西域記》的「健馱邏」（Gandhāra），¹⁵「其地在今喀布爾河下游流域，包括旁遮普（Panjab）以北之白沙瓦（Peshawar）和拉瓦爾品第（Rawalpindi）地區」。¹⁶ 綜上判斷，地勢險峻之箇失蜜（迦濕彌邏）¹⁷ 的疆域應與今克什米爾印度控制區大致相當，其都城撥邏勿邏布邏前人考定為 Pravarapura 之對音，即印控查謨-克什米爾邦（State of Jammu and Kashmir）夏治斯利那加（Śrīnagar/Srīnagar/Srinagar）之古名。彌那悉多大河（Vitastā）為今杰納布河（Chenāb River）支流杰赫勒姆河（Jehlam River / Jhelum River）。¹⁸ 北面之護密娑勒城（Sarugh-chupan）故址在今阿富汗東北瓦罕河畔（on the Wakhan River）

¹⁰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頁6251。

¹¹ 馮承鈞（原編）、陸峻嶺（增訂）：《西域地名》（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98–99；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489；Alexander Cunningham, *The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I. the Buddhist Period, Including the Campaigns of Alexander, and the Travels of Hwen-Thsang* (Delhi, India: Low Price, 2006), pp. 68–70。

¹²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頁6255–56。

¹³ 同上注，頁6256。

¹⁴ 圓照：〈悟空入竺記〉，載佚名（編）：《遊方記抄》，收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編輯）《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1990年），第五十一卷，頁980。

¹⁵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頁232–37。

¹⁶ 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28。

¹⁷ 漢、魏時稱「罽賓」，後世又有「伽溼彌羅」、「怯失迷兒」、「克失迷兒」等譯名。由於拉達克帝國的建立，唐以後此地的疆圍較前已有變化。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46；A. H.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and Minor Chronicles*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India, 1926), pp. 34–35, 92–95。

¹⁸ 參見沙畹（Édouard Chavannes）（著）、馮承鈞（譯）：《西突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152，注1、2；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1, pp. 201–2, n. 10。

的薩爾哈德村 (Sarhadd/Sarhad village)。¹⁹犍多城當今克什米爾巴基斯坦控制區的吉爾吉特城 (Gilgit)，²⁰〈悟空入竺記〉以城名國作「犍和國」，²¹穿城之娑夷水 (又稱弱水、勃律河或犍多河) 即印度河的支流吉爾吉特河。²²大城迦布羅在法國東方學家烈維 (Sylvain Lévi, 1863–1935) 與漢學家沙畹 (Édouard Chavannes, 1865–1918) 合撰之〈屬賓考〉中對應的是喀布爾 (Kabul)。²³通過上述方位之分析，沙畹綜合論證道：「大小勃律現當 Baltistan 及 Gilghit 兩地，……小勃律應為 Gilghit 區域，蓋據新書所誌之四至方位，應屬此地，此國昔在大勃律 Baltistan 之西北，而與其連界，又在箇失蜜 (Cachemire) 之北，護密 (Wakhan) 之南，復應在烏菴 (Uddiyana) 之西，傳謂『東八百里屬烏菴』誤也。東應改作西。」²⁴再與當前的行政區劃比照，小勃律所在地略當今克什米爾北部巴基斯坦控制區的吉爾吉特專區 (Gilghit/Gilgit Division)，大勃律區域則相當於今天克什米爾巴控區吉爾吉特東南方的巴爾蒂斯坦專區 (Baltistān/Baltistan Division，一譯「伯爾蒂斯坦專區」)。

續言之，西文文獻常以 Bolor 一詞來泛指勃律地區，而勃律的前身在《漢書》和《魏略·西戎傳》裏名為「縣度」，²⁵《洛陽伽藍記》、《魏書》及《北史》又謂之「鉢盧勒

¹⁹ 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 82–83；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 428。

²⁰ 《清史稿》作「幾勒幾特城」，照現今的行政區劃該地又為一個鄉 (tehsil)。參見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6–1977 年)，卷五二九〈屬國傳四〉，頁 14730。

²¹ 圓照：〈悟空入竺記〉，頁 979。

²² 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 29；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 327、428。

²³ 烈維、沙畹：〈屬賓考〉，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北京：中華書局，1957 年)，頁 60。

²⁴ 沙畹：《西突厥史料》，頁 138，注 2；頁 139，注 1、2。

²⁵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九六上〈西域傳上〉，頁 3882；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 年)，卷三十〈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頁 859；沙畹：〈魏略西戎傳箋注〉，載馮承鈞：《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七編》，頁 41–42。「縣度」顏師古(581–645)注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漢書》說烏秬國(故址在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東南喀喇崑崙山脈塔什庫祖克山南麓)之西有縣度，「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云」。《魏略·西戎傳》繼承三國時從燉煌玉門關入西域有三道，「從玉門關西出，經婁羌轉西，越葱嶺，經縣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嶺」通「嶺」，「葱嶺」即「葱嶺」，漢籍另有「播蜜川」、「波謎羅川」等譯名，當今帕米爾高原(Pamirs)；大月氏的蹤跡則不易推求，對此沙畹的注解卻深中肯綮：「按三世紀中葉大月氏佔有印度之西北。」當代研究也表明，公元一至三世紀貴霜帝國(Kushāna Empire / Kushan Empire)據有縣度時其農產、鑄幣、貿易、佛教等事業皆甚繁榮。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 73；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 487；Ahmad Hasan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Upto 2000 AD)* (Lahore, Pakistan: Sang-e-Meel, 2001), pp. 129–36。

國」，²⁶《魏書》與《北史》亦作「波路國」，²⁷《高僧傳·智猛傳》譯為「波倫國」。²⁸至《大唐西域記》則不言「勃律」單稱「鉢露羅國」。²⁹不過「勃律」之外的這些專名所對應的空間皆為唐代的小勃律地。³⁰同時沙畹等學者又說小勃律地在今 Yasin 或稱 Yassin 河流域。³¹ Yasin 一般譯作「亞辛」，乃是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 (Gilgit–Baltistan) 極西之吉澤爾縣 (Ghizer District) 西北部一片高秀的谷地，故以 Yasin 詮解小勃律不足徵信。

²⁶ 楊銜之(撰)、范祥雍(校注)：《洛陽伽藍記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297；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百二〈西域傳〉，頁2280；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七〈西域傳〉，頁3232。《魏書》及《北史》言鉢盧勒國在除彌國 (Syāmaka，約當今巴基斯坦極北之吉德拉爾縣〔Chitral District，一譯「奇特拉爾縣」〕) 東面，因進入其國之路途險惡艱阻，熙平中 (516–518) 宋雲等使臣終難「懸度」。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90。

²⁷ 《魏書》，卷一百二〈西域傳〉，頁2276–77；《北史》，卷九七〈西域傳〉，頁3228–29。鉢盧勒國又作「波路國」(其西南有罽賓國)的現象誠如羅常培 (1899–1958) 所釋：「在中國古書裏凡是一個同義複詞同時有許多異文，那一定是外來的借字而不是地道土產。」再有，《魏書》及《北史》說波路國氣候濕熱，畜有蜀馬，地勢平緩，出產金珠。細加考核，這些特質多非巴爾蒂斯坦所有，卻頗類吉爾吉特河谷之四時風土。參見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語文出版社，1989年)，頁21；Ghulam Muhammad, *Festivals and Folklore of Gilgit* (Calcutta: Printed at the Baptist Mission Press, 1905), pp. 93–109, 113–19, 126–27。

²⁸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三〈譯經下·宋京兆釋智猛〉，頁125。

²⁹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頁299–300。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將「鉢盧勒」構擬作伊朗化的 Palūrag，「鉢露羅」之原語他又考定為梵化形式的 Palūra。巴基斯坦考古學巨擘艾哈邁德·哈桑·達尼 (Ahmad Hasan Dani, 1920–2009) 則依金石資料及前賢成果推測，「鉢露羅」或源自吉爾吉特古昔之國號兼國姓「鉢菟勒–沙希」(Patola-Shahi)，在霍杜爾 (Hodur) 的一處銘文裏，Patola 的變體 (variant) 又讀作 Palola，而 Bolor 可能是大食人 (Arabs) 對該地區的譯稱。Patola 或 Palola 原為吉爾吉特一達爾德 (Dardic) 部落名，隨著佛教、後笈多婆羅米文乃至梵語的傳播，該部落勢力深入到了巴爾蒂斯坦地區，巴爾蒂斯坦也從此烙上了 Bolor 的印記。吉爾吉特阿拉姆橋婆羅米字銘文 (Brahmi inscriptions from Alam Bridge) 中的 Palalo、Palala 及相近之 Palola 亦當為「鉢盧勒」之語源——其時代均可上溯至公元四至五世紀。接此，五至七世紀左右吉爾吉特與巴爾蒂斯坦地區俱為嚙嚙人 (Huns) 支配。參見 Paul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59), pp. 91–92;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42–43, 141–51。

³⁰ 參見沙畹：〈宋雲行紀箋註〉，載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六編》(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頁30–32；沙畹：〈魏略西戎傳箋註〉，頁41–42；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16。

³¹ 沙畹：〈魏略西戎傳箋註〉，頁41–42；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16；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頁299，注1。

開元十年(722)吐蕃攻小勃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庭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³²對於唐朝這正是「用能潛應王師,克翦悖寇,葱河失險,青海無波,使我威靈遠加」。³³開元二十五年(737)赤德祖贊贊普(Khri-lde-gtsug-btsan, 698–755)在位時吐蕃再攻小勃律。「冬,贊普牙帳居於札瑪,小勃律王降,前來致禮。唐廷使者王內侍前來致禮。是年,唐廷敗盟(滅小勃律)」。³⁴對吐蕃侵伐小勃律還指責唐朝的此類言行,唐廷自然十分不滿。³⁵開元二十八年(740),吐蕃將墀瑪類(Khr-i-ma-lod)嫁與小勃律王,³⁶此即漢籍所述:「〔小勃律王〕沒謹忙死,子難泥立。死,兄麻來兮立。死,蘇失利之立,為吐蕃陰誘,妻以女。」³⁷這樁政治婚姻導致西北二十餘國為吐蕃控制。唐朝累次討伐未果,遂遣高仙芝(?–756)再征小勃律。仙芝有勇有謀率軍順利平定該國,並於天寶六載(747)招降其國王蘇失利之及吐蕃公主。³⁸《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於此也有簡明記錄,³⁹是役令「拂菻、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恐,咸歸附。執小勃律王及妻歸京師,詔改其國號歸仁,置歸仁軍,募千人鎮之。帝赦蘇失利之不誅,授右威衛將軍,賜紫袍、黃金帶,使宿衛」。⁴⁰次年正月,「勃律歸仁國王遣使獻金花」。⁴¹「蘇失利之」這一名字在罕薩(Hunza)的石刻祝文中寫作 Deva Sri Chandra Vikramaditya,其活動時間的下限約為公元749年或750年,他應該就是佛教王朝鉢菟勒-沙希的末代國君。⁴²

與征討相仿,維繫邊防穩定的代價也不小,「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

³²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頁6083。

³³ 〈賜小勃律國王難泥書〉,載董誥等(編):《全唐文》,清嘉慶十九年(1814)內府刻本(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影印),卷四十,頁二三上。

³⁴ 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增訂本),頁153。

³⁵ 張九齡:〈敕吐蕃贊普書〉,載《全唐文》,卷二八七,頁二上至三下。

³⁶ 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頁28、153。

³⁷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頁6251。

³⁸ 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卷一百四〈高仙芝傳〉,頁3203–5;《新唐書》,卷五〈玄宗紀〉,頁146;同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頁6251–52。唐軍的進軍路線沙畹已有詳盡考釋,此不贅述。參見沙畹:《西突厥史料》,頁140–42,注2。

³⁹ 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頁30、154–55。

⁴⁰ 《新唐書》,卷二二一下〈西域傳下〉,頁6252。

⁴¹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四〉,頁十六下。

⁴²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154, 163–64, 168–69.

軍，於是初有和糴」。⁴³ 這段材料說明小勃律確為唐朝之西徼，而苦於邊疆軍需物資供應不足，政府只好用議價交易方式向百姓強徵糧食。

話說回來，唐朝對勃律的控御並不穩固。天寶八載(749)，吐火羅國(Tokhāristān，藏語 Tho-gar)⁴⁴ 葉護失理忙伽羅奏其鄰境有一胡曰羯師(Khasa，藏語 Kha-sha，漢語又作「羯師」)，⁴⁵ 居處深山，依附吐蕃，「知勃律地狹人稠，無多田種，鎮軍在彼，糧食不充。於箇失蜜市易鹽米，然得支濟。商旅來往，皆著羯師國過」。⁴⁶ 其王遂「於國內置吐蕃城，投勃律要路。與吐蕃擬將兵入境，臣每憂懼，思破兇徒。望請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乞允臣所奏。……元宗覽表，許之」。⁴⁷ 天寶九載(750)二月，「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破羯師，虜其王勃特沒」。「三月庚子，立勃特沒之兄素迦為羯師王」。⁴⁸ 羯師事件說明唐蕃在勃律外圍的貿易與軍事爭競也異常激烈。

由於地處絲路喉衿，對唐朝和吐蕃而言大小勃律潛在的政治利益無疑相當誘人。從權力控制角度探察，作為阻止唐朝西進的堅盾，無可否認大勃律與吐蕃的關係更為緊密而牢固，⁴⁹ 儘管在同化當地人的過程中吐蕃必定耗費了不少時間和精力。在宗教傳承層面上，唐代新羅僧慧超述及吐蕃治下的大勃律「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寶」。⁵⁰ 該地的佛教很可能是公元三或四世紀從烏菴國傳入的(一說為大貴霜時期[Age of the Great Kushanas，約公元一至三世紀]由屬賓或縣度引入)，由藏文石刻可知，藏傳佛教在大勃律區域曾盛極一時，現存公元1000年左右的石刻文就著錄有如下禮佛心跡：勸化眾生造立寺院，繪製並修復壁畫；向諸佛菩薩像祈請：皆願奉行正法；頂禮三寶，供養上師，上師及其自傳乃至曼荼羅(mandala)均有令諸有情遠離病苦惱憂之功德。⁵¹ 另一方面，由於擁有一定的地利，此地居民與西來之大食人

⁴³ 《新唐書》，卷五三〈食貨志三〉，頁1373。

⁴⁴ 當今阿富汗興都庫什山(Hindukush)與阿姆河(Amu Darya / Oxus)上游之間的區域。參見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464–65。

⁴⁵ 轄境應與今巴基斯坦吉德拉爾縣相當。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49–50；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184。

⁴⁶ 〈請賜箇失蜜王勅書表〉，載《全唐文》，卷九九九，頁二七下。

⁴⁷ 王溥：《唐會要》(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年)，卷九九，「吐火羅國」條，頁1773。

⁴⁸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資治通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一六〈唐紀三十二〉，頁1469。

⁴⁹ A. H. Francke, *A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One of the Unknown Empires*, rev. ed. (Delhi, India: Motilal Banarsidass, 1998), p. 33; Parvez Dewan, *A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New Delhi: Manas, 2011), p. 32.

⁵⁰ 慧超(原著)、張毅(箋釋)：《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64。

⁵¹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 67; A. H. Francke and Prem Singh Jina, *First Collection of Tibetan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on Rock and Stone from Ladakh Himalaya* (Delhi, India: Sri Satguru, 2003), pp. 2–3, 102–3;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129, 135–36, 213.

(Arabs) 及景教徒 (Nestorian Christians) 的頻繁交流甚至先於吐蕃和這些「西方人」的接觸。⁵² 反之，唐王朝與大勃律似只享受了一段不長的蜜月期。開元五年 (717)，玄宗 (712–756 在位) 曾冊封蘇弗舍利支離泥為勃律國王並嘉許道：「卿歷代酋渠，執心忠肅，遙申誠款，克修職貢。謝知信由其遠略，郭虔瓘所以足兵。行觀郁成授首，何止匈奴斷臂。是用命爾為勃律國王。爾宜善始令終，長奉正朔，寧人保國，慶及苗裔。」⁵³ 如前所述，後來蘇麟陀逸之繼位又加冊封。然而大勃律非比大月氏，吐蕃也不是匈奴的翻版。相形之下，唐廷對小勃律的冊文多了點感情色彩：「地雖限於絕域，心每歸於本朝。」⁵⁴ 中亞情勢的變動也促使唐朝和吐蕃不約而同將經略的目光投向了小勃律：小勃律歸降吐蕃後其王即時來朝貢，吐蕃繼將公主嫁到小勃律；玄宗更與小勃律王確立了所謂父子關係，小勃律接受冊封後亦時有朝見之舉，此可謂懷柔時光。吐蕃以「假道攻四鎮」⁵⁵ 為藉口屢擊小勃律；唐於小勃律先後置綏遠軍、歸仁軍，且留其王作人質，此又為兵戎年月。當然，唐蕃都有一個共同的敵人，那就是大食 (Tāzīk/Tāzī，藏語 Ta-zig/Stag-gzig)，故此唐蕃在勃律爭雄也有鞏固各自西疆的目的。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所說的小勃律，藏文拼作 Bru-sha、Bru-zha 或 Bru-zha-yul。⁵⁶ 當前我們無法斷定殘缺的敦煌文書是否記敘過大勃律的史事，但藏族史家確乎更在意 Bru-sha，正如漢文史籍中「小勃律」的出現頻率更高，這也是歷史的客觀反映。英國藏學家大衛·斯內爾格羅夫 (David Snellgrove) 在其代表作《印-藏佛教源流》(Indo-Tibetan Buddhism: Indian Buddhists and Their Tibetan Successors) 中認為，唐朝鼎盛時極欲掌控具有中亞門戶意義的大勃律 (巴爾蒂斯坦) 和小勃律 (吉爾吉特)，但二地連同其他小邦 (藏語所謂吐蕃之「上方」或「西部」[Stod-phyogs]) 最後仍為吐蕃控制。除了軍力強大，象雄⁵⁷ 人顯然為吐蕃軍隊提供了嚮導和征夫，而小勃律受本教影響也很深。斯內爾格羅夫特別指出，勃律一般拼作 Bolor，此外還有多種拼寫，如漢文的「鉢露羅」，穆斯林史料的 Belur 等。⁵⁸

吉爾吉特與巴爾蒂斯坦東北面是綿互的興都庫什山 (漢籍之「大雪山」)⁵⁹ 和喀喇

⁵²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 31.

⁵³ 〈冊勃律國王文〉，載《全唐文》，卷三九，頁一上。

⁵⁴ 〈冊小勃律國王麻來兮文〉，載《全唐文》，卷三九，頁四上。

⁵⁵ 《新唐書》，卷二一六上〈吐蕃傳上〉，頁 6083。

⁵⁶ 王堯、陳踐：《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頁 27、28、30。Bru-sha 又轉寫作 Bru-śa，Bru-za 為 Bru-zha 的另一轉寫方式。Bru-zha-yul 意即小勃律國、小勃律地。Bru-sha 也拼作 Hbru-śal，Hbru-śal 現一般轉寫為 Bru-shal。出於對原著的尊重，上述轉寫特例本文均予直錄，但常規轉寫悉遵威利 (Wylie) 方案。

⁵⁷ 象雄即漢籍之「羊同」，被吐蕃王朝征服前本教 (Bon) 曾是其國教。

⁵⁸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p. 354; p. 357; p. 388, n. 18; p. 400.

⁵⁹ 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 32。

崑崙山 (Karakorum/Karakoram)，南面為喜馬拉雅山西段，極北則是帕米爾高原。高山、冰峰、深谷圍繞著這片土地，其地理、氣候、生物均呈現出喜馬拉雅靈域的種種特徵，世界上三十座 7,500 米以上的山峰有十二座位於這一地區。⁶⁰《大唐西域記》就說小勃律 (鉢露羅國)「在大雪山間，東西長，南北狹。多麥豆，出金銀，資金之利，國用富饒。時唯寒烈，人性獷暴，薄於仁義，無聞禮節。形貌龐弊，衣服毛褐」。⁶¹同書玄奘 (602–664) 還補續道：「波謎羅川南，越山有鉢露羅國，多金銀，金色如火。」⁶²物產方面此書的一些記述與《魏書》及《北史》並無二致。慧超亦言此國「貧多富少，山川狹小，田種不多」。⁶³大勃律同樣是「地狹小，山川極險」。⁶⁴民窮國富緣於其高寒之境卻有礦藏資本，是故早在閻膏珍 (Vima Kadphises，約 95–127 在位) 秉政時期，貴霜便佔據該地鑄造金幣而開金本位制之先河。⁶⁵與之相應，印度河上游流域淘金挖銀的掌故和遺蹟曾交織出一幕幕狂熱的歷史影像，加之地扼絲路要衝以及一至十一世紀本教和佛教的傳播，⁶⁶勃律乃至阿里三圍的經濟和文化價值往往超出常人想像。對此斯內爾格羅夫有一段精彩的論述，他說于闐國的佛教原由迦濕彌羅一位頗具神通力的阿羅漢毘盧遮那 (Vairocana，《大唐西域記》作「毗盧折那」) 創立，藏文文獻又將之視作文殊菩薩的化身。「毘盧遮那」一名不僅暗示其與毘盧遮那佛有關，且彼時很可能存在一條從迦濕彌羅經小勃律到達于闐的佛教傳法路線，這條路線至遲在五世紀就已形成，儘管路途艱險，但與取道薄佉羅 (Bactria) 和健馱邏地區的長線相比，佛教徒必會優先考慮該路線——貴霜帝國奉佛及玄奘法師返唐皆仰此道。在印度西北部遭受嚙噠 (Ephthalite Huns) 等入侵者摧殘後，佛法傳向中亞諸國的路線也大抵發生了變化：即由恆河上游流域啟程，再經迦濕彌羅抵達于闐，其間還要穿越山區商路，幾乎是直線行進。⁶⁷

⁶⁰ Omar Farooq Zain, "A Socio-Political Study of Gilgit Baltistan Province," *Pakist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30, no. 1 (September 2010), pp. 181–82.

⁶¹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頁 299。

⁶² 同上注，頁 982。

⁶³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頁 69。

⁶⁴ 同上注，頁 64。

⁶⁵ 漢文史料有云：「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八八〈西域傳〉，頁 2921。

⁶⁶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p. 9–11, 39–41; idem,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35, 94–95; John Vincent Bellezza, *The Dawn of Tibet: The Ancient Civilization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pp. 101–2;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30, 129–32; Pandit Anand Koul, *Geography of the Jammu & Kashmir State*, 2d ed., rev. (Calcutta, India: Thacker, Spink & Co., 1925), p. 10;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p. 35–37, 70.

⁶⁷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p. 334;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頁 1009–10。

Bru-sha 之地望和文化

北宋初有僧人繼業應詔入天竺求取舍利和佛經，其西域行程記有一段如是寫到：「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溼彌羅國。」⁶⁸沙畹認為布路即唐時小勃律地，⁶⁹「布路州國」當為小勃律所在區域。《宋史·外國傳》繼言乾德四年(966)「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耆、龜茲、于闐、割祿等國，又歷布路沙、加濕彌羅等國，並詔諭其國令人引導之」。⁷⁰敦煌本《西天路竟》亦云：自疏勒國(當今新疆喀什地區)「又西南行二十餘日，至布路沙國。又西行二十餘日，至迦濕迷羅國」。⁷¹從敘事習慣及求經路線觀察，拙見以為「布路沙」即藏語 Bru-sha 之對音，其前身便是唐代的小勃律，「布路州國」則為藏漢結合的譯法。此外，十一世紀布路沙被歸依伊斯蘭教的突厥人控制，經歷了一個伊斯蘭化的過程，⁷²而在此前的九至十世紀突厥人已大舉侵入該地區。若按本土史觀考量，十至十一世紀的布路沙歲月實與達羅汗(Trakhan/Trakhàn/Tarkan/Tarkhan)第一王朝後期及第二王朝前期相對應。⁷³十二世紀宋人洪皓(1088–1155)所著《松漠紀聞》裏又說遼天祚帝(1101–1125在位)在走投無路時很想歸附宋朝，但慮及大觀年間(1107–1110)曾杖責過宋使，「以是故，恐不加禮，迺走小勃律，復不納，乃夜回」。⁷⁴《契丹國志》也有相似敷述，⁷⁵可見遼代仍有「小勃律」這一地名。

至此我們不難理解，Bru-sha 所在的地域與唐、遼時的「小勃律」及宋代之「布路沙」相仿，即約當今吉爾吉特專區。斯內爾格羅夫在《印-藏佛教源流》中就曾明確標示此一對應關係(Bru-zha-吉爾吉特)，⁷⁶意大利藏學家朱塞佩·圖齊(Giuseppe Tucci,

⁶⁸ 范成大：《吳船錄》，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校正重刊《知不足齋叢書》本，卷上，頁二十上。

⁶⁹ 沙畹：《魏略西戎傳箋注》，頁41–42。

⁷⁰ 脫脫等：《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四百九十〈外國傳六·天竺〉，頁14104。

⁷¹ 王仲榮：《〈西天路竟〉箋釋》，載王仲榮(著)、鄭宜秀(整理)：《敦煌石室地志殘卷考釋》(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頁311。

⁷² Roberto Vitali, "Some Conjectures on Change and Instability dur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of Darkness in the History of La dwags (1280s–1380s)," in John Bray, ed., *Ladakhi Histories: Local and Regional Perspectives* (Leiden: Brill, 2005), p. 114, n. 18.

⁷³ 「達羅汗」一名取自該國一位君主的王號——「吐羅汗」(Torra Khan, 1241–1275在位)。近千年間達羅汗人在該地形成了權力金字塔的尖頂，吉爾吉特、罕薩、那噶爾(Nagar)的王室皆屬此一大族。達羅汗王朝一般分作八個階段，第八王朝至1840年左右方告完結。參見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155–56, 163–95, 202, 401。

⁷⁴ 洪皓(撰)、張海鵬(訂)：《松漠紀聞》，清嘉慶十年(1805)虞山張氏照曠閣刊《學津討原》本，頁十下。

⁷⁵ 葉隆禮(撰)，賈敬顏、林榮貴(點校)：《契丹國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34。

⁷⁶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pp. 388, 400, 410.

1894–1984) 和盧恰諾·伯戴克 (Luciano Petech, 1914–2010) 同持此見。⁷⁷ 該地原名 Sargin 或 Sargin Gilit, 通稱 Gilit, Gilit 大概是梵語 Girit (山地) 一詞的訛用, Gilit 後又被錫克和森巴征服者 (the Sikh and Dogra conquerors) 改作 Gilgit, 其上古居民講一種介於伊朗語和梵語之間的古達爾德語 (archaic Dardic language), 至二十世紀初葉拉達克人仍用「小勃律山城」(Hbru-śal-gi-lid) 這一古名稱呼吉爾吉特城,⁷⁸ 而吉爾吉特城在十世紀的于闐文中拼作 Gidagitti。⁷⁹ 美國學者白桂思 (Christopher I. Beckwith) 繼而推定: 小勃律的藏語名 Bruza 與今天居住在罕薩的布魯休人 (Burushos) 及其語言布魯夏斯基語 (Burushaski/Brushashki) 必有聯繫。⁸⁰ 不過將藏文文獻敘錄之「Bruza 語」臆測為布魯夏斯基語或「勃律語」的說法尚乏實據支持, 畢竟所謂起源於小勃律的 Drusha 文 (即 Bruza 文) 鮮有範本行世, 相關之象雄語 (Zhang-zhung language) 材料也頗多爭議, 而布魯夏斯基語當前又很難歸入任何一個語系——儘管其現代詞彙有一半以上皆能由鄰近語言找到根據, 但剩餘詞彙和結構卻足以使之孤立 (isolate)。⁸¹ 法蘭西學院 (Collège de France) 的印度學家熱拉爾·菲斯曼 (Gérard Fussman) 亦言十九世紀中期以來布魯夏斯基語雖經多位俊才考校研摩, 卻仍有很多疑義無法參透。作為一種與其他語言沒有任何親緣關係的古語, 布魯夏斯基語在罕薩河谷及亞辛等地似已「無拘無束地」生養了數百年, 然則以之為母語的先民究竟源自何方依舊是一個謎。⁸² 很難想像這樣一個族群就是「勃律人」, 他們說的話還是該國的官方語言。

⁷⁷ Giuseppe 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trans. Geoffrey Samuel (New Delhi: Allied Publishers Private Limited, 1980), p. 214; Luciano Petech, *A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Indian Tibet)* (Delhi: Low Price, 1999), p. 58.

⁷⁸ 筆者以為, 具有混合詞 (hybrid) 性質的 Hbru-śal-gi-lid 既是文化博弈的產物, 也是特定時期 Bru-sha 相當於「小勃律」的直接證據。

⁷⁹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 90;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46–47, 167; Muhammad, *Festivals and Folklore of Gilgit*, p. 93; Muhammad Feyyaz, “Sectarian Conflict in Gilgit-Baltistan” (background paper, PILDAT, Islamabad, 2011), p. 11.

⁸⁰ Christopher I. Beckwith, *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 Turks, Arabs, 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6, n. 44.

⁸¹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pp. 391–93, 403; Andrew West, “Proposal to Encode the Marchen Script in the SMP of the UCS” (JTC1/SC2/WG2 N4032, L2/11-140, 2011-04-30), pp. 1–30. Retrieved 6 December 2013, from std.dkuug.dk/JTC1/SC2/WG2/docs/n4032; Dick Grune, “Burushaski—An Extraordinary Language in the Karakoram Mountains” (17 August 1998), pp. 1–2. Retrieved 10 December 2013, from www.few.vu.nl/~dick/Summaries/Languages/Burushaski.pdf.

⁸² 參見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59, 64, 179。

一類代表性觀點認為，吉爾吉特地區起先有兩大族群：一是與漢藏語系藏緬語族西藏門巴人 (Mon-pa) 同源的門族 (Mons)，⁸³ 他們曾是西藏西陲之村鎮、城堡、佛寺及灌溉系統的創建者，但其職業多為樂師、木匠、石工、鐵匠或紡織工，社會地位較低。門族亦曾在西藏西部與北部扮演過農人、礦師、信徒和大匠的角色：土地的墾種、金礦的開採、原始本教的修習以及城堡、要塞、陵寢 (temple-tomb)、環壁神柱 (walled-in pillars) 的建造均有他們的身影映現其中。在筆者眼裏，為致命性流行病侵染而漸趨消亡的這一歷史共同體無異於雄健的拓荒者和高尚的藝術家。另一個族群則是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的達爾德人 (Dards)，公元前二或三世紀他們就在此地定居耕殖，大多族人皆能不畏強權而固守自己的語言和習俗，雖在不同時期向不同地域遷移並與外族通婚，但藏傳佛教和伊斯蘭教都很難將之徹底同化。照一般邏輯演繹，達爾德人很容易給人狹陋自大的印象，可事實並非如此，居住在拉達克的達爾德人就為當地留下了豐厚的遺產，例如岩畫、馬球以及農業。達爾德人的一支、操希納語 (Shina) 的辛人 (Shins) 或稱希納人 (Shina people) 又於十世紀征服了吉爾吉特 (布路沙)。辛人自稱是大食人的後裔，他們也可能是西來的猶太人。希納語屬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印度-雅利安語支的達爾德語 (Dardic languages)，內含許多梵語和波斯語詞彙。今天希納語已成為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的主體語言，只是因為往時山嶺阻隔及累年混戰，部分方言之間歧異甚著，彼此不易溝通。不過這並不妨礙希納語諸族群的恆久認同——拉達克的希納語移民就一直將布路沙當作他們的祖居地。另外從王統文書、佛教石刻遺跡以至 1938 年發現的第二批吉爾吉特寫本 (Gilgit Manuscripts) 可知，在十三或十四世紀伊斯蘭教傳入之前佛教和印度教都在此地流行過。印度教在吉爾吉特有自己的婆羅門 (Brahmin) 和相應的等級制度，歸依伊斯蘭教以來婆羅門後人一如既往受人尊崇，潔淨儀式的實踐及不食牛肉的禁忌也未改變。⁸⁴

吉爾吉特寫本是世界最古老的佛教寫本之一。1931 年 7 月 24 日印度的老牌英文報紙《政治家》(The Statesman) 披露了一則震爍次大陸的發現，報紙引述斯坦因 (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 的話證實，在吉爾吉特軍區 (Gilgit Cantonment) 以西約兩英里處的瑙布爾村 (Naupur village)，某個晴朗的早晨一名放牛娃 (cattle grazer) 在放牧時看到一石覆小土墩上有截凸出的殘木，接著他又發現了土墩旁帶有印記的泥版。由泥版誘發的好奇，放牛娃開始挖掘潛藏的遺構，但他挖了一陣即告停

⁸³ 同源說為筆者基於族性 (ethnicity) 觀念之淺見，尚望有識者共證。

⁸⁴ 參見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p. 15–29, 39, 61; Bellezza, *Dawn of Tibet*, pp. 24, 81, 101–2, 128–30, 143–55; Muhammad, *Festivals and Folklore of Gilgit*, pp. 94–98, 101–6, 110, 115, 122;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p. 14–15, 35–39, 70–71; Feyyaz, “Sectarian Conflict in Gilgit-Baltistan,” p. 11; Zain, “Socio-Political Study of Gilgit Baltistan Province,” pp. 184–85;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42, 45, 56–57, 150, 163–69。

手——因為他誤以為那些遺構的木樑是起墳用的。次日晨另一群村民繼續開掘土墩，他們拔除了木樑，然後鑽過下面的窟窿進到了一間圓形密室裏——原來這是座頽圮的佛塔。木構密室中堆滿了中亞及西藏常見的香塔和浮雕，伴生物則是盛於一經筒內的珍貴經卷。挖掘者將經卷交與查謨-克什米爾大王 (Maharaja, 音譯「摩訶羅閣」)，此即後世所稱吉爾吉特寫本的主體。⁸⁵寫本當時由克什米爾政府保管，現大多收藏於新德里的印度國立檔案館。彼時斯坦因從當地人手裏拿到約十一張散頁，並送交大英博物館保存，這些散頁復經烈維鑑定後寫出報告。1938年印度考古學者夏斯特里 (M. K. Shastri) 率領的考古隊對瑠布爾遺址進行了一次系統發掘，在塔基位置找到了一個更大的塔室，室中存有另一套寫本、兩份寫本的手繪梵夾木板以及法器，另外還有貌似供養物的銅器。此間著作安置於查謨-克什米爾邦政府資料庫及該邦研究部，其數量和內容尚待專家釋讀。1956年圖齊從拉瓦爾品第一小販處獲得第三批寫本，且交由卡拉奇博物館 (Karachi Museum) 保藏，影本存於意大利中東與遠東研究所 (IsMEO)。據考證吉爾吉特寫本完成於公元五世紀和六世紀之間，⁸⁶內中最著名的當屬《妙法蓮華經》 (*Saddharmapundarikasutra*) 和《月燈三昧經》 (*Samadhirajasutra*)，其載體是用笈多型婆羅米文與後笈多型婆羅米文 (Gupta Brahmi and Post Gupta Brahmi script) 寫在樺皮上的佛教混合梵語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language)，題材涵蓋宗教信仰、儀式、教義、造像量度 (iconometry)、戒律、醫方明 (medicine)、民間故事以及一些生活和知識的相關內容，例如廚藝 (culinary art)。有學者推測瑠布爾的遺構大概是一部分當地法師的精舍，寫本可能是精舍的僧物，精舍內或許還有一座藏經閣 (library)。然主流觀點認為遺構就是一座佛塔，寫本則專為某次法會而書，法會結束後即將寫本埋藏在原地，後來國王或僧俗群眾又就地起塔供奉寫本。吉爾吉特寫本 1939 至 1959 年間已陸續出版四卷，在佛典演化史及佛教社會史領域學者皆對之青眼有加。⁸⁷按筆者的想法，密室及塔室所在應即佛塔之基壇，而吉爾吉特寫本埋藏或裝藏的基本觀念實與經冢無二。與佛教相繫，《冊府元龜》尚輯有數條羈縻型小勃律史事，如天寶四載 (745) 「七月乙酉，小勃律遣僧大德

⁸⁵ 一說挖掘一事前後均係「一群放牛娃」所為，而寫本先由吉爾吉特維齊爾 (Wazir) 接管，未幾克什米爾大王又命維齊爾將寫本呈送斯利那加。

⁸⁶ 恰當漢譯之「鉢盧勒國」或「波路國」統馭該地，五世紀和六世紀之間應為鉢菟勒-沙希王朝前期。

⁸⁷ Ijlal Hussainpur, "Inside the Hidden Chamber" (20 April 2014). Retrieved 9 June 2014, from tns.thenews.com.pk/gilgit-manuscripts-in-naupur; "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 Gilgit Manuscripts" (Ref N° 2006-57), pp. 1-17. Retrieved December 15, 2013, from http://portal.unesco.org/ci/en/files/22450/1151397961157_India_Gilgit.doc/57+India+Gilgit.doc. 華裔學者有關吉爾吉特寫本的研究可參閱蔡耀明：〈吉爾吉特 (Gilgit) 梵文佛典寫本的出土與佛教研究〉，《正觀雜誌》第 13 期 (2000 年 6 月)，頁 1-126；劉震：《禪定與苦修：關於佛傳原初梵本的發現和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三藏伽羅密多來朝，授右金吾衛員外中郎將，放還蕃」。⁸⁸不過佛教似未在鉢露羅扎根，玄奘就說此地「伽藍數百所，僧徒數千人，學無專習，戒行多濫」。⁸⁹

Sbal-ti 之鄉土與記憶

依據 Bru-sha 之地望以及巴爾蒂人 (Balti-pa/Baltis) 聚居於巴爾蒂斯坦的事實，我們可以進一步推斷藏語 Sbal-ti 指向的空間大體就是唐代的「大勃律」，或當今世之巴爾蒂斯坦專區，目前當地居民多為信仰伊斯蘭教的巴爾蒂人與信仰本教或佛教的藏族。約在十四世紀末至十六世紀期間改宗伊斯蘭教的巴爾蒂族多屬什葉派 (Shia) 穆斯林，推及整個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地區，當前什葉派穆斯林也強勢地佔到總人口的 75% 左右。⁹⁰ 摩拉維亞弟兄會傳教士 (Moravian Church missionary)、德國藏學家福來克 (August Hermann Francke, 1870–1930) 在初版於 1907 年的《西藏西陲史——另一個塵封的帝國》一書中曾談及巴爾蒂人與普通藏族人的差異：「如史所證，巴爾蒂人較一般西陲藏族入更為勇悍；他們能快人一步採用新方法處理問題，且整體上更為機敏。」⁹¹ Baltistan 又是由族名衍出的波斯語地名，意為「巴爾蒂家園」，藏語形式即 Sbal-ti-yul 或 Sbal-ti'i-yul。⁹² 據語言學家考較，巴爾蒂語 (Balti，藏語 Sbal-ti'i-skad) 與拉達克語 (Ladakhi) 同屬西部古藏語方言，現無官方文字。巴爾蒂人原有自右向左書寫的古代文字，八世紀大勃律為吐蕃統轄時始用藏文，十三世紀早期怯失迷兒人亦不刺金沙 (Ibrahim Shah) 草創基業時仍以藏語「馬草本」(Makpon/Maqpon) 為其國號，⁹³ 十七世紀由於伊斯蘭教的顯著影響阿拉伯文又取代了藏文在該地的位置。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印度語言研究機構為巴爾蒂語及相關語言研製出天城

⁸⁸ 《冊府元龜》，卷九七五〈外臣部·褒異二〉，頁二一上。

⁸⁹ 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記校注》，頁 299。

⁹⁰ 參見 John Powers and David Templem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ibet*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2012), p. 619;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27, 216–18;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p. 67–68; Feyyaz, “Sectarian Conflict in Gilgit-Baltistan,” pp. 11–12。

⁹¹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 67: “The Balti is, as history proves, rather braver than the average Western Tibetan; he is quicker in adopting new methods and altogether more alert.”

⁹²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 193; Powers and Templeman,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ibet*, p. 619;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 31.

⁹³ 「馬草本」又係一尊號，藏文轉寫作 Dmag-dpon，意為「軍官、將領」。其時亦不刺金沙（一說來自埃及）娶沙迦兒嘉勒卜 (Shakar Gyalpo) 宗室女為妻，馬革本王權由此喜獲強援，吐蕃宰制結束後巴爾蒂斯坦地區也見證了一個新王朝的崛起。十三世紀初至十四世紀末，這一具有多元文化特性的獨立王國有效遏制了伊斯蘭教的傳播，令佛教得以繼續保有國教地位，然十六世紀初伊斯蘭教最終取代佛教一躍而為當地的主流宗教。參見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165, 215–18。

體梵文的擴展形式，近年巴爾蒂人又在努力復興藏文的用法。⁹⁴因為藏族文化的長期浸染，巴爾蒂斯坦至今還有「小吐蕃」之別稱。「小吐蕃」源自十六世紀莫臥兒時期 (Mughal period) 的波斯語 Tibet-i-Khurd，英語即 Little Tibet；與之匹配的是拉達克的異名「大吐蕃」(波斯語 Tibet-i-Kalan/Tibet-i-Buzur，英語 Great Tibet)。⁹⁵顧名思義藏文化在拉達克居於主導地位。另據《阿克巴大帝實錄》(Akbarname) 記載，自阿克巴 (Akbar, 1556–1605 在位) 時代起這兩個地區已有分別，1589 年阿克巴大帝更分遣使臣赴二地。二地並受克失迷兒總督節制。⁹⁶

關於巴爾蒂族的族源，學界意見尚欠一致。福來克等學者認為巴爾蒂斯坦的族群由雅利安人和藏族人構成，其中雅利安系的達爾德人稍佔優勢，此可推溯至史前時期印歐語系移民浪潮對當地生態的衝擊。另有民族主義者及部分學者堅稱巴爾蒂族是伊朗族群中唯一講藏語的支系，在伊斯蘭教傳入之前一直秉持藏族文學傳統。還有學者指出類似爭論毫無意義，因為伊朗族群實為「純種」雅利安人，兩種看法並不相左。巴爾蒂族可謂伊朗人與藏族人的混融體，正如該族群歸依真主後格薩爾藝人依然在巴爾蒂斯坦說唱《格薩爾王傳》(Ge-sar-gyi-sgrung)，傳奇勇毅的格薩爾王 (Gesar of Ling / Kesar) 也是當地穆斯林心目中英武的俠士和高潔的楷模 (role-model)。⁹⁷

西方學者的研究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除沙畹的鋪墊外，一些學者對 Balti 亦早有關注。希臘-羅馬賢哲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y, 約 90–約 168)、法國漢學家儒蓮 (Stanislas Aignan Julien, 約 1797–1873)、印度考古之父亞歷山大·坎寧安爵士 (Sir Alexander Cunningham, 1814–1893) 於此問題便有過或多或少的闡發。福來克在兩卷本的《印度藏區考古記》(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⁹⁸ 及《西藏西陲史》中又將這

⁹⁴ Philip Denwood, "Early Connections between Ladakh/Baltistan and Amdo/Kham," in Bray, *Ladakhi Histories*, p. 32;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 67; Anshuman Pandey, "Introducing Another Script for Writing Balti" (ISO/IEC JTC1/SC2/WG2 N3842, L2/10-231, 2010-07-13), pp. 1–10. Retrieved 6 December 2013, from ftp://std.dkuug.dk/JTC1/SC2/wg2/docs/n3842.pdf.

⁹⁵ Jigar Mohammed, "Mughal Sources on Medieval Ladakh, Baltistan and Western Tibet," in Bray, *Ladakhi Histories*, p. 148; Petech, *Study on the Chronicles of Ladakh*, p. 115.

⁹⁶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48, 51, 219–20.

⁹⁷ 參見 Francke,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p. 41, 67; Bellezza, *Dawn of Tibet*, p. 144;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 30, n. 1; p. 71。

⁹⁸ 首次對《拉達克王統記》(La-dwags-rgyal-rabs) 進行整體考訂及英文全譯構成了《印度藏區考古記》第二卷之主體。如福來克所言，《拉達克王統記》的價值在於它描寫西藏西陲的內容蓋多取自當地的第一手史料。在福來克之前，有三位德國藏學家曾對《拉達克王統記》的藏文抄本和副本做過蒐集、整理、翻譯乃至注釋的工作，他們是藏傳佛教專家埃米爾·施拉京特魏特 (Emir Schlagintweit, 1835–1904)、摩拉維亞弟兄會的語言學家葉斯開 (H. A. Jäschke, 1817–1883) 以及因傷寒早逝於列城 (Leh) 的摩拉維亞弟兄會首位醫學傳教士卡爾·魯道夫·馬克斯 (Dr. Karl Rudolf Marx, 1857–1891)，而坎寧安爵士前此已由烏爾都文 (Urdu) 轉譯過部分拉達克史料。在前輩研究的基礎上福來克又整合各種抄本、別

[下轉頁 74]

些前輩的成果加以融匯，他們的論點可概括如次：玄奘所說的「鉢露羅」(Po-lu-lo)即為 Bōlor 一詞的漢譯，其地與 Balti 或 Baltistan 相當。達爾德人將 Balti 或 Balti-yul 喚作 Palolo、Balor 或 Bolor，藏族則稱之為 Nang-khongs、Nang-gong (近代巴爾蒂斯坦的通稱)或 Nang-kod，⁹⁹而 Balti (Sbal-ti) 一名可謂家喻戶曉，大概也是此地最古老的名字，一如托勒密記錄之 Byltae (Byltae 與 Balti 音近)。¹⁰⁰托勒密所言 Byltae 靠近 Imaus mountains，¹⁰¹依照瑞典地理學家及探險家斯文赫定 (Sven Anders Hedin, 1865–1952) 的分析，Imaus mountains 應指喜馬拉雅山系。¹⁰²Balti 也因其都城名為「斯噶爾多」(Skardo，藏語 Skar-rdo，「星石、隕石」之意)，《西域古藏文文書》及藏文大藏經中亦以 Skar-mdo 稱巴爾蒂斯坦方域。Skardo 當今巴爾蒂斯坦首府斯卡都 (Skārdu/Skardu)，一說 Skardu 尚有「低地、窪地」之異義。¹⁰³福來克還據多處遺跡演證：吐蕃西陲 (Rgya-sde) 某要地原有一寺院，叫做 Skar-chung-rdo-dbyings-kyi-gtsug-lag-khang，意即「小星隕石寺」，該寺建於吐蕃贊普塞那累 (Sad-na-legs)¹⁰⁴踐政時期 (約在公元 804 年)。要地之名 Skar-rdo 或為 Skar-chung-rdo-dbyings 的簡稱——因二者含義相同，這大約是史書中第一次提到大勃律王庭。福來克進而補充了斯坦因的

〔上接頁 73〕

本和異本，並輔以石刻文、詔令、寺院之禮讚文等資料，對《拉達克王統記》重加校勘、補訂和譯注，文稿付梓前復由英國印度學家及藏學家陶瑪斯 (F. W. Thomas, 1867–1956) 審訂，從而成就了一部精校精注精譯之《拉達克王統記》。是書先在開篇追溯了一番吐蕃贊普世系，繼此述及朗達瑪 (Glang-dar-ma，約 836–841 / 838–842 在位) 曾孫吉德尼瑪袞 (Skyid-lde-nyi-ma-mgon，約 900–930 在位) 西逃至阿里稱孤的事件。尼瑪袞與卓薩闊瓊 ('Bro-za-'khor-skyong) 育有三子，三人分別承襲了阿里三圍的封地，領有瑪域一帶且奠定拉達克帝國基業的便是太子喇欽白季袞 (Lha-chen-dpal-gyi-mgon，約 930–960 在位)。《王統記》之下限則延至森巴戰爭 (Dogra War, 1841–1842) 結束後的一段時期 (1842–1909)。全書詳近略遠，尤重十五世紀以降之故實。本文使用的《拉達克王統記》便是此一善本。美中不足的是，原著作者之名號當時後世皆無從考索，只知道一些喇嘛參與過這部王統史的修撰。另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6 年據一藏文抄本也刊行過《拉達克王統記》。參見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1–15, 34–35, 59, 90–96, 148; Martin, *Tibetan Histories*, p. 109。

⁹⁹ Nang-khongs 即「腹地」之意。

¹⁰⁰ Cunningham, *Ancient Geography of India*, pp. 70–71;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32, 85, 193; idem, *History of Western Tibet*, pp. 12, 31–32.

¹⁰¹ Claudius Ptolemy, *Geography of Claudius Ptolemy*, trans. Edward Luther Stevenson (New York: Cosimo Classics, 2011), p. 144.

¹⁰² 參見 Sven Hedin, *Trans-Himalaya: Discoveries and Adventures in Tibet (1909–1913; reprint, New Delhi: 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 1999)*, pp. 117–18。

¹⁰³ Snellgrove, *Indo-Tibetan Buddhism*, p. 351;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 218.

¹⁰⁴ 即赤德松贊贊普 (Khri-lde-srong-btsan，約 798–815 在位)。

觀點：Balti 就是八世紀中國史家筆下之大勃律，小勃律則對應吉爾吉特。¹⁰⁵ 值得一提的是，福來克和坎寧安在悉心解讀文獻之餘均做過大量的田野工作。

Bru-sha 與 Sbal-ti 合論

清代地志對故往大小勃律區域的認知已趨成熟，《西域圖志》便將 Gilgit (Bru-sha) 寫作頗有古意的「博洛爾」¹⁰⁶（《清史稿》作「博羅爾」¹⁰⁷），其地「在拔達克山東。有城郭，戶三萬有奇。四面皆山，西北面有河」。¹⁰⁸ 拔達克山《清史稿》作「巴達克山」，¹⁰⁹ 即 Badakhshan，¹¹⁰ 包括今阿富汗東北的巴達赫尚省 (Badakhshan Province)、阿富汗瓦罕走廊 (Wakhan Corridor) 以及塔吉克斯坦東南的山地巴達赫尚自治省 (Gorno-Badakhshan Autonomous Province)。Balti 或 Sbal-ti (Baltistan) 則音譯作「巴勒提」¹¹¹（《新疆識略》作「巴爾替」¹¹²），其國「在博洛爾南」。¹¹³ 清代地理學家徐松 (1781–1848) 在《西域水道記》中也說：「達外藩凡三道。自塞勒庫勒南十四日程，曰巴勒提，又東南一日程，至其屬邑曰哈普倫；哈普倫南十六日程，曰土伯特，即藏地也。……又西南三日程，曰乾竺特，歲貢金一兩五錢。又西四日程，曰博洛爾，其地南即巴勒提，曾貢劍、斧、匕首。」¹¹⁴ 塞勒庫勒地即今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自治縣。¹¹⁵ 哈普

¹⁰⁵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33, 89, 193; Stein, *Ancient Khotan*, vol. 1, pp. 5–8.

¹⁰⁶ 《馬可波羅行紀》沙海昂 (Antoine Henry Joseph Charignon, 1872–1930) 注本中馮承鈞 (1887–1946) 將 Belor 譯為「博洛爾」便是依循清代的稱呼。參見沙海昂 (注)、馮承鈞 (譯)：《馬可波羅行紀》(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頁 141。

¹⁰⁷ 《清史稿》，卷五二九〈屬國傳四〉，頁 14722–23。

¹⁰⁸ 傅恒等 (奉敕撰)：《欽定皇輿西域圖志》，清乾隆四十七年 (1782) 武英殿刻本，卷四六〈藩屬三〉，頁十上。

¹⁰⁹ 《清史稿》，卷五二九〈屬國傳四〉，頁 14721–23。

¹¹⁰ 參見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 8。

¹¹¹ 顯王阿力捨兒汗 (Ali Sher Khan Anchan, 約 1595–1625/1633 在位) 盡施文韜武略鑄造了巴勒提的一統盛世，但三位封君卻難續輝煌，十八世紀巴勒提已現衰相，而論其式微根源又大致有二：一是馬革本眾王子因覬覦王位竟同室操戈，一是巴勒提諸侯間自相魚肉。比較起來莫臥兒人的威脅倒是小多了。參見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219–28。

¹¹² 松筠 (纂修)：《欽定新疆識略》，《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道光元年 (1821) 武英殿刻本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十二〈外裔〉，頁一下。按：此書實為徐松編撰。

¹¹³ 《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四六〈藩屬三〉，頁二七下。《瀛環志略》又說博羅爾和巴勒提俱「稱其酋曰『比』」，「比」當為「伯克」(Beg) 之別譯。參見徐繼畲：《瀛環志略》，清道光三十年 (1850) 刊本 (臺北：華文書局，1968年影印)，卷三，「西域各回部」條，頁五二上；《清史稿》，卷五二九〈屬國傳四〉，頁 14722–23；James A. Millward,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 100–101。

¹¹⁴ 徐松 (著)、朱玉麒 (整理)：《西域水道記 (外二種)》(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 51。

¹¹⁵ 馮志文等：《西域地名詞典》，頁 392。

倫 (Khaplu/Khapalu)¹¹⁶ 今譯「哈伯羅」或「克伯盧」，現為巴爾蒂斯坦岡切縣 (Ghanche District) 縣治。此外，天寶十二載 (753) 唐朝名將段秀實 (719–783) 曾隨封常清 (?–756) 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改綏德府折衝」。¹¹⁷ 按「賀薩勞城」宜作「賀菩勞城」，¹¹⁸ 即哈普倫的前朝譯名。再說博洛爾東北之乾竺特，「乾竺特」(Kanjut) 漢文又翻作「坎巨提」或「喀楚特」，均是借本土族名譯罕薩邦名，其地當今吉爾吉特專區罕薩–那噶爾縣 (Hunza-Nagar District) 的阿里阿巴德 (Aliabad) 及卡里馬巴德 (Karimabad)。資料顯示乾竺特並不在博洛爾的轄區內。¹¹⁹

時間轉回唐代，慧超嘗言：「其大勃律，元是小勃律王所住之處，為吐蕃來逼，走入小勃律國坐。首領百姓，在彼大勃律不來。」¹²⁰ 從這段陳述來看，勃律被分割成大小二部的直接原因乃是吐蕃的逼壓——而深層原因還在於唐蕃針對勃律這一西域戰略要地進行的拉鋸戰。再者，慧超的文字從一個側面解釋了大勃律之所以又稱「布露」的原因：「布露」應即勃律一分為二前的國名 Bolor，「波路國」或「勃律」不過是同名異譯，宋之「布路」或「布路沙」(Bru-sha)，清之「博洛爾」，均在實際意義上保留了此一原始通稱，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地區頗有民族主義色彩的舊名「勃律斯坦」(Baluristan/Balawaristan/Boloristan) 也同樣折射出大小勃律本為一家的事實。¹²¹ 照應前論，筆者忖測該國分裂前之國名當無他稱，只因不同語言或不同方言在國名拼寫或發音上略有變體意義的差別，故漢文相應有「鉢盧勒」、「波路」、「波倫」、「鉢露羅」、「勃律」等多種譯法。至此讀者可能會問：沙畹以 Bolor 為小勃律，坎寧安和福來克的研究表明 Bolor 或 Palolo 指大勃律，二者是否矛盾呢？其實不然，若我們對「鉢盧勒」至「勃律」的相關文獻用心稽索一番就不難推知，大小勃律原為一國，分裂

¹¹⁶ 《西域圖志》同謂「哈普倫」，《新疆識略》又作「哈普隆」，藏語 Kha-pu-lu。此地之土長號為「葉護」(Yabgu)，其政權蓋與拉達克同興，不過「葉護」這一突厥語稱號已很難探本窮源。清代史料雖以哈普倫為巴勒提屬邑，然十六至十九世紀哈普倫與巴勒提及拉達克之間皆和戰無常，百姓並不安寧。參見《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四六〈藩屬三〉，頁二七下；《欽定新疆識略》，卷十二〈外裔〉，頁二上；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165, 224, 231–36。

¹¹⁷ 《舊唐書》，卷一二八〈段秀實傳〉，頁3583。

¹¹⁸ 參見《資治通鑑》，卷二一六〈唐紀三十二〉，頁1473。

¹¹⁹ Hunza 在《清史稿》中譯為「棍雜」(「棍」通「混」)，Nagar 又作「哪格爾」。罕薩河谷遺存以十六世紀重修的兩座王城最為雄麗，此即「長兄」阿勒提特堡 (Altit Fort) 及「幼弟」巴勒提特堡 (Baltit Fort)。是時罕薩王阿亞舒二世 (Ayasho II) 與巴勒提公主莎哈敦 (Shah Khatun) 合婚，莎哈敦之父阿卜都勒汗 (Abdal Khan) 遂遣巴勒提良匠前往罕薩繕理二城，聯姻也增進了兩地之間的交流。參見《清史稿》，卷五二九〈屬國傳四〉，頁14726–30；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30–32, 46, 198–200。

¹²⁰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頁69。

¹²¹ 參見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 92; Dani, *History of Northern Areas of Pakistan*, pp. 40–41, 400;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p. 35, 70, 150–51。

後 Bolor 依然是彼此認同的國名，只是坎寧安和福來克等人說的是 Great Bolor，與之相對則是 Little Bolor 了。正如慧超所言，退守一方的小勃律，其「衣著人風，飲食言音，與大勃律相似」。¹²²當然在中夏人來說，迄至遼、宋他們仍對唐代「屬漢國所管」¹²³的小勃律（宋之「布路」或「布路沙」區域）更為熟悉，吐蕃化的大勃律倒不免有距離感了。至於《大唐西域記》所述之「鉢露羅」，筆者還是贊同沙畹的看法，即位於波謎羅川南而又為中土僧俗青睞之東西長、南北狹的小勃律地，儘管玄奘生活的時代勃律未必處於分裂狀態。相反，至少在旅行規劃及交流經驗這兩個關鍵的論域裏，大勃律地不大可能成為各類行者密切關注或無故冒險的對象，即論唐以前的情形稍加推想也大抵如此：「鉢盧勒」或「波路」雖係整體性國名，但大多華域人士實難由其國西北部（小勃律地）跋涉到東南部（大勃律地）之腹地，由是對後者的體認必然模糊。前文「大小勃律古事辨」節有關「縣度」、「鉢盧勒國」、「波路國」、「鉢露羅國」之按語以及斯內爾格羅夫闡釋的路徑便是這一論見之有力佐證。

邊事頻仍令早先獨立的孤絕古國迅速蛻變為強敵執持的邊疆鎖鑰，《拉達克王統記》即云吐蕃贊普貢松都杰 (Gung-srong-'du-rje)¹²⁴ 在位時 (676–704 / 679–704) 疆域遼闊，按福來克的考證大略為：東濱黃河 (Rgyal-po'i-chu)，南接泥婆羅 (Bal-po，今尼泊爾)，北抵烏玉河流域 (Kra-krag-dar-chen/Karakash，今新疆喀拉喀什河流域)，西控大勃律 (Sbal-ti)。¹²⁵ 針對器弩悉弄時期之吐蕃境域《舊唐書》的概述則是：「東與涼、松、茂、嵩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陷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¹²⁶ 「婆羅門」指印度。史載吐蕃南疆時有叛亂，並不安穩，是故藏、漢史籍對吐蕃南界的描敘互有差異。安西是唐蕃爭奪的焦點地區，長壽元年 (692) 唐武威軍總管王孝傑 (?–697) 曾克復四鎮，¹²⁷ 但嚴格來講此乃吐蕃的北方戰事，流經于闐的烏玉河也處於這一地帶。換句話說，《舊唐書》所論之西界與《王統記》所定之北界實有部分重合。筆者以為漢籍之所以向讀者「緊縮性」地傳遞上述西疆信息，其主因還是唐廷對大勃律役屬吐蕃的現實很不甘心，如此「北抵突厥」的說法也顯得較為含糊。至於對吐蕃東境的闡述，《舊唐書》之筆鋒倒是比《王統記》更為「銳利」。《拉達克王統記》的版圖表述非止一代，作者談到桑耶寺 (Bsam-yas-gtsug-lag-khang) 建成後國泰民安，家給人足。赤松德贊 (Khri-

¹²² 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頁 69。

¹²³ 同上注。

¹²⁴ 藏文史書一般稱作「都松芒布杰·隆朗楚」 ('Dus-srong-mang-po-rje Rlung-nam-'phrul)，又名「赤都松」 (Khri-'dus-srong)，「器弩悉弄」即 Khri-'dus-srong 的唐譯。參見劉立千：〈吐蕃贊普生卒年代重考〉，載《劉立千藏學著譯文集·雜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頁 9–10。

¹²⁵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32, 84–85；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頁 42。

¹²⁶ 《舊唐書》，卷一九六上〈吐蕃傳上〉，頁 5224。

¹²⁷ 同上注，頁 5225–26。

srong-lde-btsan, 755–797 在位) 當國期間吐蕃的疆界已東接唐朝 (Rgya-nag), 南極印度 (Rgya-gar), 西取大、小勃律 (Sbal-ti-dang-'Bru-shal¹²⁸), 北抵安西四鎮。「安西四鎮」藏文作 Hor-gyi-sa'i-cho-o-don-kas-dkar, Hor 係藏語, 其所指區域略當現今之新疆, 福來克又以 Kas-dkar 為「疏勒」(Kashgar), 然 Sa'i-cho-o-don 卻難解其義。參照伯希和的考辨, Kas-dkar 對應「疏勒」, O-don 或 Odon (幹端) 是中古時期突厥語及蒙古語對「于闐」的稱呼,¹²⁹ Sa'i-cho 呢? 筆者忖度應為漢語「四鎮」之音譯, 此點《舊唐書》等著作的載述可資輔證: 貞元五年 (789) 吐蕃率眾輪番攻打北庭都護府 (故址即今新疆吉木薩爾縣北面之北庭故城), 北庭軍民眼見敵人勢頭勁猛, 加之迴紇勒索無度, 遂於次年舉城降附吐蕃。貞元七年 (791) 秋迴紇與唐曾聯手發起收復北庭的行動, 卻終告失敗, 「自是安西阻絕, 莫知存否, 唯西州之人, 猶固守焉」。¹³⁰ 不幸的是, 就在當年西州 (今新疆吐魯番盆地一帶) 亦「沒於西蕃」;¹³¹ 而在 794 年之前的某個時期吐蕃已徹底征服于闐, 接著又向于闐人徵收賦稅。綜括來說, 自安西陷落至吐蕃衰亡, 唐朝抑或迴紇均無力重奪四鎮。¹³² 故此, Hor-gyi-sa'i-cho-o-don-kas-dkar 或可釋作「安西四鎮」。再加剖析, 這一混融式地名至少涉及藏、漢、突厥三種語言, 誠為各路勢力在安西競逐霸業之歷史縮影。繼後, 迄熱巴巾 (Ral-pa-can, 約 815–836/838 在位) 御政時吐蕃仍能保有前代疆土——小勃律 ('Bru-shal) 依舊為其西門,¹³³ 其宰制之餘威則沉澱在了「布路沙」的意蘊中。《拉達克王統記》的這些輿地實錄不僅為我們勾勒出了吐蕃帝國三個繁盛階段的山河邊界, 且大、小勃律的西境屬性非常清晰, 自是本文考論的堅實支柱。

在《蓮花生大士傳》的英譯本 (*Guru Rinpoché: His Life and Times*) 中, 譯者阿旺桑波 (Ngawang Zangpo) 引述了奧地利人類學家卡爾·耶特瑪爾 (Karl Jettmar, 1918–2002) 的一組「獨見」。耶特瑪爾說由於叛服無常, 赤德祖贊、赤松德贊、赤祖德贊 (Khri-gtsug-lde-btsan, 即熱巴巾) 三代贊普執政期間都不得不再征討 Bru-za (即 Bru-zha 之誤拼) 和 Sbal-ti。流行的主張還揭示出這兩個地區深厚的宗教及文化底蘊——佛教徒和本教徒皆奉之為聖地, 所謂 Bru-za 語在蓮花生 (Padmasambhava) 種種傳奇的書寫中也意義非凡。¹³⁴ 然而他隨即話鋒一轉: 「事實上, 儘管已有數百年的往來, 藏文文獻對吉爾吉特地區卻無其他稱謂。據說 Sbal-ti 指的是巴爾蒂斯坦, 即昔日之大勃律。Bru-za 又如通常假設的那樣——定然等同於小勃律, 當地人的族稱

¹²⁸ 'Bru-shal 福來克寫作 Hbru-śal。

¹²⁹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32–33, 86–88; Pelliot, *Notes on Marco Polo*, vol. 1, pp. 207–9, 412–16; 馮承鈞、陸峻嶺: 《西域地名》, 頁 45、51。

¹³⁰ 《舊唐書》, 卷一九六下〈吐蕃傳下〉, 頁 5257。

¹³¹ 李吉甫 (撰)、賀次君 (點校): 《元和郡縣圖志》(北京: 中華書局, 1983 年), 卷四十〈隴右道下·西州〉, 頁 1031。

¹³² 參見 Beckwith,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p. 143–72。

¹³³ Francke, *Antiquities of Indian Tibet, Volume II*, pp. 33–34, 89–90。

¹³⁴ Ngawang Zangpo, *Guru Rinpoché: His Life and Times* (Ithaca, NY: Snow Lion, 2002), p. 70。

似被吐蕃人用來替代該國的官方國名。」¹³⁵ 易言之，Bru-sha 大約是吐蕃入侵小勃律後強加給受害者的符號，而 Sbal-ti 對應大勃律、Bru-sha 對應小勃律能否成立也是個問題。依前所論 Bru-sha 應為 Bolor 的藏譯，沒有文獻證明這是刻意改換的排他性國名。國外學者雖對 Sbal-ti 和 Bru-sha 缺乏系統性研考，但 Sbal-ti 與 Bru-sha 的對譯絕非臆測妄說。退一步講，一個地名即使是他稱，也不能否定其對應地域的存在，就像唐朝在小勃律置綏遠軍，征服小勃律後改其國號為歸仁，但漢文史料從不曾因此竄改「勃律」的史實。不過耶特瑪爾的駁論並未成為學界主流，畢竟同情被征服者的立場無法為他帶來足夠證據。

當代的吉爾吉特與巴爾蒂斯坦原稱「北部地區」(Northern Areas)，現政治地位相當於巴基斯坦的一個聯合自治省，首府為吉爾吉特城。其地南鄰巴控自由克什米爾 (Azad Kashmir)，西接巴基斯坦開伯爾-普什圖省 (Khyber Pakhtunkhwa)，北臨瓦罕走廊，東界中國新疆和印控查謨-克什米爾。巴基斯坦學者奧馬爾·法魯克·扎因 (Omar Farooq Zain) 在汲取前人研究菁華後認為，歷史上這片土地曾屢遭侵略，且不乏內部爭併，不過從演進的視角考察，史前巨石的建造者 (Megalith Builders)、達爾德人 (Dardic people)、健馱邏人 (Gandharans)、亞歷山大東征之子遺 (Alexander's remnants)、塞種 (Scythians，斯基泰人)、安息人 (Parthians)、大貴霜人 (Great Kushans)、嚙嚙人 (Huns)、吐蕃人 (Tibetans)、達羅汗人 (Tarkhans) 等，還有中亞、呼羅珊 (Khurasan) 以及印度的統治者，他們對這個多族群、多語言、多區域社會的文化嬗變 (cultural evolution) 皆貢獻至巨。今天置身於此地，我們仍能聽到烏爾都語 (Urdu)、希納語、科瓦語 (Khowar)、瓦希語 (Wakhi)、巴爾蒂語以及布魯夏斯基語。¹³⁶ 古遠的岩畫、杳渺的神話、通靈的薩滿、智慧的諺語、輝煌的佛教、壯美的絲路、探幽的行者，這些傳統或變動的因子最終凝集為靜謐的環境和璀璨的文化。¹³⁷ 故此，「儘管整個地區屢次落入周邊各入侵者之手，但眾多社會群體的互動在此後的韶光裏卻滋育出了古典意義上的多樣性」。¹³⁸

¹³⁵ Ibid., p. 71: "In fact, the Tibetan literature has no other name for the area of Gilgit in spite of contacts over many centuries. Evidently, sBal-ti means Balistan, the former Great Bolor. Bru-za must be identical to Little Bolor, as generally assumed. It seems that the Tibetans changed 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state to the name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¹³⁶ 巴基斯坦國語烏爾都語屬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的印度-雅利安語支，烏爾都語也是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的通用語；科瓦語屬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印度-雅利安語支的達爾德語；瓦希語則是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東伊朗語支帕米爾語的一種；希納語、巴爾蒂語和布魯夏斯基語前已述及。

¹³⁷ 參見 Zain, "Socio-Political Study of Gilgit Baltistan Province," pp. 181-90; Dewan, *History of Ladakh, Gilgit, Baltistan*, pp. 31-32。

¹³⁸ Zain, "Socio-Political Study of Gilgit Baltistan Province," p. 183: "The whole area fell to different invaders from surrounding territories time and again but the interaction of numerous social groups germinated a classical diversity for the times to come."

以語言和宗教為例，吉爾吉特–巴爾蒂斯坦的文化呈現出雜糅的特徵，而從拉達克向西北貫穿這一區域，藏族文化的作用力又因歷史和地理因素漸次淡化——拉達克的「藏味」最濃，巴爾蒂斯坦屬於「過渡地帶」，吉爾吉特人對藏傳佛教則有些陌生了。

結 語

發生在不同族群、不同國家間的一些事件和行動其實均有翻譯這一溝通行為充當媒介，例如朝貢、冊封、戰爭、結盟、締約、通婚、宰制、貿易、求法、傳教、遷徙、同化、融合等等。翻譯會牽引自–他文化之間的碰撞、交集和吸納，由此本鄉人傑對異域文化勢必有不一般的感知；而雙方交流越是頻密，此方對彼方的稱謂便越有專門化的趨向。對於古昔族稱和國名的傳譯經過及傳譯結果，各語種通事自了然於胸，然今人要逐譯相關專名卻少不了一番細緻的考掘和解析，殊非易事。延及本文主題，既是對古史地名的整體性描述，開篇所言《安多政教史》的 Bru-sha 和 Sbal-ti 譯作漢文就宜採用最具歷史特性之名稱，即 Bru-sha 應是「小勃律」，Sbal-ti 當為「大勃律」。從地名演變的角度來講，不同時代不同語境之 Bru-sha 亦可譯為「布路」、「布路沙」、「博洛爾」等，Sbal-ti 又有「巴勒提」之對譯。進言之，若以 Bru-sha 稱呼現代意義的地名，漢語應作「吉爾吉特（專區）」。

同理，Sbal-ti 或 Sbal-ti-yul 的目標語 (target language) 自非「巴爾蒂斯坦（專區）」莫屬。語言和地理之外，筆者認為在地名考釋和譯解過程中也不能忽略時勢、生態、族群以至宗教等區域構成性要素，如此，地名的機體或許會還原得更加豐滿。

A Study of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ru-sha and Sbal-ti

(Abstract)

Wang Pu

Mdo-smad-chos-'byung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History of A-mdo*)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historical works in Tibetan historiography which contains many place names in Tibetan history, involvi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book, Bru-sha and Sbal-ti, two significant names. However, Bru-sha and Sbal-ti have not been exactly translated from Tibetan into Chinese by scholars. In effect, Bru-sha and Sbal-ti are closely related with Bolü or Bolor in Chinese historical record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of the relevant toponym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culture change in the areas of Bru-sha and Sbal-ti based on analyses of the past of Great Bolor and Little Bolor. Furthermore the author tentatively considers Chinese translation of Bru-sha and Sbal-ti in different contexts from his painstaking research. Meanwhile, several crucial historical facts are present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light of this research. In addition,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some titles, proper nouns and terms in this paper mirror the ideas and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in praxis.

關鍵詞： Bru-sha Sbal-ti 漢譯 源流 勃律 吉爾吉特 巴爾蒂斯坦

Keywords: Bru-sha Sbal-ti Chinese translation origin and evolution Bolor Gilgit Baltistan